

高等中医药院校外国进修生教材

中国医学史

HISTORY OF TCM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op

高等中医药院校外国进修生教材

中国医学史

编	写	甄	志	亚
审	订	傅	维	康
		陈	道	瑾
		周	敬	平

中医古籍出版社

高等中医药院校外国进修生教材

中国医学史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

中国中医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6.25印张 14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013-002-9/R·002

统一书号: 14249·0210 定价: 2.75元

前 言

为促进祖国医学的国际交流，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外国进修生学习中医的需要，国家教委外事局和卫生部中医司于1986年4月在广州召开外国进修生中医教材审定会议。会议期间审查了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国医学史》；上海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内科学》、《汉语》；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药学》、《方剂学》；广州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诊断学》、《针灸学》共八种外国进修生教材。

参加主编的四所中医院校开展外国进修生教育多则十几年，少则五、六年时间，对外国进修生的教育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多数主编老师负责过中医院校全日制该科统编教材的编写，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早已运用于外国进修生的教学之中，因此是一套比较成熟的，适用于外国进修生的中医教材。

本教材吸取了中医院校全日制统编四、五版教材的内容，并注意到使用对象在学时间不长，及存在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等特点，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教材的科学性、思想性、先进性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力求做到既要篇幅短小、文字通俗，又不失中医特色，保持中医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

高等中医药院校外国进修生教材的公开出版，标志着祖国医学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培养留学生、进修生是中医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医学的对外教育定会有较大的发展。在今后教学实践中，希望广大师生对本套教材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以利总结经验，逐步完善。

国家教委外事局

卫生部中医司

一九八六年四月

编写说明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它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千年以前，甚至更远古的时代。

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有着完整的医学理论，丰富的实践经验，精湛的医疗技术，科学的医疗思想，卓越的医疗效果，是我国各族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今天仍然是我国人民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重要力量。同时，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它被称为东方医学一颗灿烂的明珠，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

中国医药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在医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和极其辉煌的医学成就。早在公元前6世纪，当世界上多数人还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鬼神作怪的时候，中国的名医医和已经用“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失和来解释病因了，这种朴素唯物的病因观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先进的；公元前5世纪，我国已经有了著名的医生扁鹊，他掌握了多种诊疗技术，对内、妇、儿、五官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都达到了当时较高的水平；公元2世纪，杰出的医学家华佗，精于外科，并发明中药麻醉剂——“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成为外科史上光辉的一页；公元4世纪，医药学家葛洪，在炼丹中观察到一些物质变化的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化学试验，被称为制药化学的先驱；7世纪，唐政府颁行流通全国的《新修本草》是最早由国家颁布的药典；11世纪针灸专家王惟一与能工巧匠一起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是当时最先进的教具模型；12世纪，法医学专家宋慈所著《洗冤录》一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14世纪，骨伤科专家危亦林发明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是伤科史上的创举；16世纪，我国已经广泛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直到18世纪贞纳发明牛痘接种后才代替了它，被称为免疫学的先声；17世纪，传染病学家吴有性对传染病病因提出了新的概念——“戾气学说”，在细菌学出现以前，这一发现是十分可贵的；举世闻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和他的巨著《本草纲目》，更是我国古代科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中国医学史上辉煌的成就，受到各国人民与学者的重视，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他说：“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①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的医药似乎主要是不受外来的影响而走自己的道路。”^②他并强调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必须说，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③这些见解都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很值得重视。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总论第一章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七章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总论第一章

在中国医学史上不仅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而且,经过数千年的逐渐积累,还保存下来大量的医学文献,据统计,现存全国医药图书一万余种数十万册,收藏在各大图书馆内,数量之大,门类之多,浩如烟海,为世界各国所罕见。此外,还有许多散在民间的著作、医案以及验方、单方、秘方,其数量更是无法计算。

中国医学史上还有一大批著名的医药学家,有正史记载的约有4500多位,仅《清史稿》有传记的也有300多位,他们在人类的保健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医药学家的名字有的已被列入世界科学史册。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0多个民族,除汉族外,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朝鲜族、鄂伦春族、傣族等等都有着本民族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方法,蒙医的“三根学说”,藏医的《四部医典》等都是中国医药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医药学不但在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制定了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遗产,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医政策,中医药事业不断放出新的光彩。建国以来,中国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西医团结合作,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如针刺麻醉的创造,使我国在这个学科领域内跃居先进地位;中西医结合小夹板固定治疗四肢骨折的新疗法,方法简便,骨折愈合快,病人痛苦小,功能恢复好,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针拨白内障是继承发扬中医传统疗法的又一新成果;中药治疗烧伤,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也都获得了满意的疗效。

历史和现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当前我国的中医药事业正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前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医药学主要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必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它不仅包含我国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而且,也掺杂了一些唯心主义的糟粕。因此,学习中国医学史,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正确认识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这也正是我们开设本课程的目的。

中国医学史是研究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阐明医学的实践和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医学成就的相互联系;揭示医学发展的规律;正确论述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科学状况与医学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总结医学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医学发展的借鉴,促进医学科学的进步。

通过中国医学史的教学,我们希望使大家了解中国医药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中国医学史上著名医药学家的杰出贡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的新发展。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教学采取重点讲授与系统自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教材编写是一项需要不断充实提高的重要工作,本书是根据对国外进修生、留学生教学的要求,参考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重新编写,经上海、广州、南京中医学院的医史教授和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堪温研究员审订而成。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肯定存在一些不妥之处,希望各院教师和读者不断提出修改意见,以便再次修订。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二月

目 录

第一章 医药学的起源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远古——公元3世纪中叶)

第一节 医药学的起源 (1)

一、卫生保健的起源 (1)

二、药物的发现 (2)

三、外治法与针灸的起源 (3)

第二节 早期的医药卫生保健活动 (4)

一、对疾病的初步认识 (4)

二、酒和汤液的发明 (5)

三、早期的卫生保健 (6)

四、医事制度的建立 (7)

五、医与巫的斗争 (8)

第三节 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9)

一、《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9)

二、《神农本草经》奠定了中药学的基础 (12)

三、《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 (13)

四、著名医学家——扁鹊和华佗 (15)

第二章 医药学的全面发展

(公元3世纪中叶—公元14世纪)

第一节 基础理论的整理与提高 (19)

一、古医籍的整理注释与刊行 (19)

二、医学理论的总结与提高 (22)

第二节 药物学的进步 (24)

一、新出现的本草著作 (24)

二、炼丹术与制药化学 (25)

三、药物炮炙方法的总结 (26)

四、饮食疗法的形成 (28)

第三节 方剂学的发展 (29)

一、实用性方书的出现 (29)

二、综合性方书的编纂 (30)

第四节 临证各科的形成与发展 (31)

一、内科 (31)

二、针灸科 (32)

三、外科 (33)

四、骨科 (34)

五、妇产科 (35)

六、儿科 (36)

第五节 金元医家的创新 (37)

一、刘完素 (37)

二、张从正 (37)

三、李杲 (38)

四、朱震亨 (38)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 (39)

一、中朝医药交流 (39)

二、中日医药交流 (40)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40)

四、中阿医药交流 (41)

五、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42)

第三章 医药学的新成就

(公元14世纪——19世纪中叶)

第一节 医学理论的研究与整理 (43)

一、古典著作的整理 (43)

二、各类医书的编纂 (44)

三、解剖学的发展 (44)

第二节 药物学的巨大成就 (45)

一、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45)

二、《本草纲目》后的药物学著作 (46)

第三节 方剂学的成就 (47)

一、现存最大的方书——《普济方》 (48)

二、应用性方书 (48)

第四节 温病学说与人痘接种术 (49)

一、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49)

二、人痘接种术的发明 (51)

第五节 临证各科的进一步发展 (51)

一、内科 (52)

二、外科与伤科 (52)

三、妇产科 (54)

四、儿科·····	(54)
五、眼科与喉科·····	(55)
六、针灸科·····	(55)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	(56)
一、中朝医药交流·····	(56)
二、中日医药交流·····	(56)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医药交流·····	(57)
四、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57)

第四章 中国医药学的缓慢发展

(公元1840年——1949年)

第一节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继续传播与 发展·····	(59)
一、西方医学的继续传播·····	(59)
二、西医学在我国的发展·····	(61)
第二节 中西汇通派的产生及其代表医家 ·····	(62)
一、唐宗海·····	(63)
二、朱沛文·····	(64)
三、恽铁樵·····	(64)
四、张锡纯·····	(65)
第三节 中医学的继续发展·····	(66)
一、医学文献的研究和整理·····	(66)
二、临证医学的发展·····	(67)
三、药物学和方剂学的成就·····	(69)

四、创建中医学校与学会·····	(70)
第四节 近代的医药卫生状况·····	(71)
一、旧政府对中医药学的摧残与中医界 的反抗·····	(71)
二、国民党统治区的医药卫生状况·····	(72)
三、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72)

第五章 中国医学发展的新阶段

(公元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第一节 卫生工作方针·····	(74)
第二节 医药卫生工作的成就·····	(74)
一、城乡卫生建设·····	(75)
二、疾病防治·····	(75)
三、科学研究·····	(76)
四、医学教育·····	(77)
五、少数民族的医药卫生工作·····	(77)
六、医药工业·····	(78)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78)
一、中医工作的开展·····	(78)
二、中药的生产与科研·····	(79)
三、中西医结合的成就·····	(80)

附：中国医学大事年表·····	(83)
-----------------	------

第一章 医药学的起源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远古——公元3世纪中叶)

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和发展,是与我国人民长期的劳动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医药知识的积累,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人们认识疾病,战胜疾病的经验总结。

第一节 医药学的起源

我国医药学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远古到公元前21世纪),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原始社会史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起点,从遥远的时代起,人类的最初祖先经过与自然界的艰苦斗争,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使自己离开动物愈来愈远。同时,也为世界文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中国医药学的起源,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了人类,便有了医疗活动。中国是发现人类化石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根据考古发掘,在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劳动着。我国考古工作者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境内发现的元谋猿人,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考古发掘和人类化石的研究丰富了原始社会时期医学史的内容。它更有力地证明:医药学起源于原始人在劳动生活中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

一、卫生保健的起源

卫生保健的起源,首先要从火的发明谈起,原始人发明用火,对人类卫生保健的进步具有重大的作用,最初人类是利用自然野火,后来逐渐学会了保存火种和人工取火。在我国北京周口店,以及山西、陕西、河南、云南等省,都发现了原始人活动的遗迹。考古工作者在中国猿人居住过的山洞里,发现了很厚的灰烬,有的成层,有的成堆,灰烬里还有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表明原始人经常在洞里烧烤兽肉。开始他们还不会人工取火,只是把天然火引到洞里,一代一代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后来才逐渐地掌握了摩擦生火的技术。火的使用,帮助人类驱散黑暗,带来了光明;抵御寒冷,带来了温暖;防御野兽的侵袭,加强了自卫的能力。火的使用,使原始人由生食变为熟食,扩大了食物的种类,大大缩短了消化食物的过程,使人体从食物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减少了一些疾病的发生,增强了人类的体质。火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解放的一个巨大推动力,提高了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人类保健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原始社会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人们有了弓箭、鱼叉、鱼钩等,在狩猎中便可以获得更多的猎物 and 捕到一些鱼类。在原始农业逐步发展的条件下,人们开始吃到谷物和蔬菜,考古学家从陕西、浙江等地的原始社会遗址的窖穴和陶罐中发现了粟的皮壳、稻谷、谷壳和白菜籽、芥菜籽,证明我国种植和食用粮食、蔬菜的历史相当悠久。地下还出土了一些原始社会时期用陶制作的炊具如鼎、罐、碗、盆、盘、杯等,以及壁炉、陶灶。说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食物来源的不断扩大,饮食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这对人类的卫生保健都有相当的促进

作用。

原始人学会缝制衣服,这也是一项最早的卫生保健措施。起初人们为了御防寒冷的气候,便用兽皮、树皮覆盖身体。进入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刮削、磨制工具的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逐渐学会了原始的纺织术。在相当于这一时期的遗址里发现了骨针、骨锥、石纺轮、陶纺轮和麻布的痕迹。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发现的骨针,长82mm,最粗的直径3.3mm,针身圆滑,针尖尖锐,针眼窄小,制作这样的骨针,必须切割兽骨,加以刮削,挖穿针眼,再加磨制,对原始人来说是一套比较复杂的技术,制作成功是很不简单的事。仅从骨针已可证明,这时已经能用兽皮缝制衣服了。在浙江河姆渡和陕西西安半坡村等几处遗址,还发现了陶制、石制的纺轮,管状的骨针、木刀、木棒等原始的纺织工具,在出土的陶器上还留有布纹的痕迹以及原始的麻布。在陕西、河南、甘肃发现的布痕,一平方厘米有经线、纬线各十根。说明人们已经知道剥取野麻的纤维,用纺轮捻成细线,再用原始织机和骨梭织成麻布。这时人们还知道鞣软皮革,使之更加耐用和舒适,有了麻布和皮革,妇女们就用精巧的骨针、骨锥制成衣服。人们穿上了衣服不仅有益于自身的保健,而且成为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

原始人为了防御野兽和狂风暴雨的侵袭,在长期与毒蛇、猛兽的搏斗中,要求有比树上和山洞更有利于生存的住处,便逐渐学会了建造房屋。一般说来,早期原始社会的人们大都住在天然的山洞里,氏族公社产生以后,人们挖穴栖身或开始搭起一些窝棚之类的住处。到了母系氏族社会以后,原始人开始建造简陋的房屋,基本上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原始社会时期的房屋残迹有不少保存下来,在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发现有40多座遗址,房屋的样式有方形和圆形两种,以半地穴的方形房屋多见。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氏族村落,总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在居住区密集地排列着四、五十座房屋,是氏族成员的住处,其中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长方形房屋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一般的圆形房屋多数是平地盖起,上有尖顶,有的室内立有对称的石柱,以支撑屋顶,为了加固柱基,主柱周围还附上很厚的泥圈,夯打结实,木柱上架设横梁和椽子,再铺盖柴草,加强抵御风雨的效果。人们有了这样的房屋可以躲避风雨寒暑,防御猛兽毒蛇的伤害,过上了比较安全的生活,当然有利于人类的健康。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逐渐对于精神生活也有了要求,在劳动中创造了精神文化,如绘图、音乐、舞蹈和一些美丽的装饰品。人们在狩猎出征或丰收归来的时候,举行祝福和庆功,自发的跳跃起来,久之,人们便体会到这种活动可以解除疲劳,振奋精神,舒筋壮骨,有益健康。于是便产生了我国古代医疗保健的方法叫做“导引”,也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医疗体育。

总之,原始社会时期,食物的丰富,衣服的制作,房屋的建造,“导引”的出现,都是人类最早保护自身的活动,也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开端,成为我国医学史上卫生保健的起源。

二、药物的发现

人类发现药物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因此,我国古代有药食同源的传说。

最早原始人靠采集野果、种子和掘取植物的根茎充饥,在饥不择食和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经常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学会辨别某种植物可以催吐,某种植物可以泻下,某种植物含有毒性,逐渐认识到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时偶然吃到的某些植物,减轻甚至消除了原有的病痛,这

样便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的知识。人类先发现的药物可能是一些块状的或毒性较大、药物作用明显的植物，如商陆、藜芦、大黄。后来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在栽培的过程中，认识了更多的植物，其药用部分，或取其皮，或取其叶，或取其根茎，或取其花卉，或取其果实、种子，其中以草类为多，所以我国古代药物又叫“本草”。

原始人在狩猎活动中，吃到了一些肉类食物，畜牧业兴起以后，在饲养动物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多的吃到一些动物的肉和脏器，渐渐认识了一些动物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鸡、猪、鹿等，尤其是狗既可供食用又可成为原始人打猎的助手。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发现某些动物的治疗作用，如以动物的脂肪、血液、骨髓来治病，或以动物的内脏治病，古书记载：“何罗之鱼……食之已痛”^①“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②，便是对我国古代人们从食用动物中发现动物药的描述。

进入金属冶炼时代以后，出现了金属加工业，甘肃等地遗址发现了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铜制品，如铜刀、铜戈等。冶炼技术的发明，才使人们有可能认识了一些矿物药。

综上所述，可知药物的发现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古代传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③。便生动地反映了原始人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三、外治法与针灸的起源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不能有效地抵抗猛兽、饥饿、疾病的侵袭，生命短暂，疾病众多，死亡严重是很自然的普遍现象。据古人类学者研究：“北京猿人”遗址中发掘的四十多个个体骨骼化石，14—15岁死亡的占三分之一强，活到50—60岁的只占2.6%。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十余座小孩墓，其中大的15岁左右，一般约10岁左右，有的尚属几个月的婴儿。说明由于生活条件差，疾病多，儿童夭折是大量的。疾病流行，外伤感染都会是经常发生的事。人类最早发生的病疾可能外伤很多，在发掘的原始人遗骸上大多可见到伤痕，北京周口店遗址中，山顶洞人的头骨上便留有被尖状器物所伤的痕迹。原始人在与毒蛇、猛兽搏斗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经常会发生外伤，因此，用泥土、树叶、草茎等涂裹伤口的方法就逐渐产生了。久而久之，经过长期的反复应用，人们便发现了一些适合外伤治疗的药物和一些简单的包扎方法。

灸法的产生与火的发明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人在烧烤食物或用火取暖时，发现身体靠近火的部位舒适，甚至减轻了局部原有的疼痛，逐渐使用烧热的石块、砂土固定在身体疼痛的部位，保持更长久的热度，缓解由于潮湿、寒冷引起的疼痛。经过多次的试验，人们逐渐发明了热熨法。以后，又不断改进，用树枝或干草、或艾蒿一类植物作燃料，进行局部固定的温热刺激，治愈了更多的疾病，慢慢形成了灸法。

针术的起源与原始人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原始社会初期，人们不可能有专用的医疗器具。石铤、石斧、石刀等既是生产工具、又可当作切开脓肿、排脓放血的医疗器具使用。随着人们制造石器技术的进步，开始根据不同的用途，磨制各种不同形状的石器，砭石便是一种锐利的石器，考古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医疗工具。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在内蒙古、山东、河北、云南、湖南、河南等地陆续发现一些多种形状的砭石，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砭石，长4.5 cm，一端扁平，有半圆形刃，可以

①②《山海经》 ③《淮南子·修务训》

切开脓肿，另一端呈锥状，可作针刺之用，中间的手持处为四棱形；1965年湖南省华容县长岗庙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三件磨制精细的石器，都是单面斜刃，刃口锋利，可以切开皮肉，排脓引流，作为医疗器具使用。其它如在山东省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采集到两枚锥形砭石；河北省新郑县遗址中，出土的一枚砭石，一端卵圆，可用以按摩，另一端呈三棱形，可以放血。考古发掘中还有骨针，如山东省平阴县朱家桥商周遗址出土的骨针，长约8cm，锐端为圆锥尖，钝端卵圆。其它地方也有同类骨针出土。这些一端锋利，另端无孔的骨针，很容易被用作医疗器具。后世所使用的金属针具便是在砭石、石针、骨针等原始针具基础上的发展和更新。

关于原始人怎样以石治病的历史过程，现在很难具体描述。从我国有关古代传说和古书的记述中可以想象古人用砭石治病的情形。传说伏羲氏“尝草制砭，以治民疾”。《说文解字》称：“砭，以石刺病也。”《黄帝内经》一书更具体论述了砭石的由来及其应用，《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肿，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南方者……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可见砭石的应用确是我国针术的萌芽。

关于医药学起源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医药学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还是起源于圣人、巫术和动物的本能。学者们进行过不少探讨和争论，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在医学领域的反映。在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某个阶段，人们战胜疾病，是用医药解除病痛，还是迷信天命用巫术进行祈祷，两种不同的医疗观念长期共存，并且相互排斥和斗争，这是医学史上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国医学的发展，正是不断清除唯心论的影响，牢固的建立在古代朴素唯物论的指导思想之下，逐渐形成自己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的。

第二节 早期的医药卫生保健活动

公元前21世纪，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公元前5世纪起过渡到封建社会。其后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

奴隶社会时期，依靠广大奴隶的劳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知识比原始社会高，医药学这时也有比较明显的进步。

一、对疾病的初步认识

这一时期，人们对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种古文字——甲骨文^①中已经记述了二十多种疾病的名称，如疾首（头痛）、疾耳（耳病）、疾自（鼻病）、疾齿（牙病）、疾腹（腹痛）、疾止（足病）、疾子（小儿病）、疾育（妇产病）等，大部分是按人体不同部位来区分，也有的是根据疾病的特征来定名，如疟、疥、蛊、龋等，蛊（𧈧）象虫在皿中，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𪚩）表示牙齿上的窟窿，是由虫蛀的。甲骨文关于龋齿的记录，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发现，比埃及、印度、希腊等古国的类似记载，大约早了七百年至一千年。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关于疾病的文字是反映生理功能失常的，如“口疾言”，意

^①高周时代刻在龟甲上的文字。亦称“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

思是咽喉有病，不能讲话，“丧明”是眼睛失明以及耳鸣、失眠等等。尤其是关于“贞出（有）疾年其并（死）”的记载，说明当时已认识到有多疾之年，这可能是对流行病的最早记录。

公元前8至7世纪时，人们认识了更多的疾病。根据现存早期的一些有关著作来看，这时已能够按照疾病的特点，记述了20多种疾病的固定名称：如癭、痢、疔、痔、痈、肿、疔、疽、疥、聋、狂、癰、瘰疾、风、疫疾、痴疾、癬、疣、痿等^①。这比甲骨文按身体部位对疾病进行分类的认识显然前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还表现在对疾病产生的原因已有初步认识，逐渐清除了鬼神观念和巫术迷信的影响。在《周礼》、《礼记》、《左传》、《吕氏春秋》等早期的非医学著作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知道疾病的发生与饮食、气候、居住环境、精神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

《韩非子·五蠹》记述“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臊腥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指出了饮食与肠胃病的关系。《周礼》记载：“春时有痛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疔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月令》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左传》还指出：“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薄水浅……其恶易觐。”《吕氏春秋》记载：“轻水所，多秃与癭人；重水所，多瘖与聋人。”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以及某些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与疾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还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会引起疾病的流行和流行病有传染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位名医医和，在他给晋侯看病时，明确地提出了“六气致病说”的朴素唯物主义病因观。他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即是说四时、五节、六气等气候变化和人的劳逸失度是发生疾病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表明人们开始摆脱鬼神致病说的束缚。

二、酒和汤液的发明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们用药的经验日益丰富，药物知识的积累，促进了药物治疗范围的扩大，发明了药酒、复方和汤液。

我国记载药物早期的著作有《诗经》、《山海经》。《诗经》是我国最早而又一直受到人民喜爱的一部诗歌集，内容包括“风”（民歌）“雅”（朝廷乐歌）“颂”（祭祀的歌），是经过口头流传记录整理保存下来的，因此，它不是一个时期和一个人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以前，我国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被称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从中可以看出那时民间已有采药之风，书中描述了当时人们采药的情景，其中有些采药歌写得非常生动活泼，如“采芣苢”^②和“卷耳”^③就是描写妇女们采集芣苢和卷耳时所唱的歌，读起来娓娓动听。

《诗经》中记载的植物药常见的有艾（苦艾）、虻（贝母）、芣苢（车前）、卷耳（苍耳）、杞（枸杞）、莢（泽泻）、葇（桑寄生）、女萝（菟丝子）、蒿（青蒿）、芩（黄芩）、芍药、白茅（茅根）、木瓜、葛（葛根）、苓（甘草）、莞（白芷）、兰（佩兰）、

^①《山海经》

^②芣苢：音fúyǐ，古书指车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和种子入药。

^③卷耳：古书指苍耳，俗名猪耳朵菜，可食用和药用。

桃（桃仁）、桑（桑叶）、台（香附子）、柏（侧柏）、枣等约有50多种。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地理名著。原为口头传说，可能是在公元前5世纪时记录成文，后人又有增补，所以也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主要内容是民间传说的地理知识，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药物知识，书中记载动物药63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4种，关于矿物的记录，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该书所收药物可治疾病数十种，包括内、外、五官、妇产、皮肤等科，对药物的类别、形态、产地、效用、特点、药性、主治等均有论述，其使用方法可分内服与外用两大类。反映了当时药物知识的丰富，为后世药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随着药物知识的积累和用药经验的丰富，发明了药酒和汤液。

我国酿酒的历史相当悠久，酒的起源，可以追述到原始社会时期，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贮藏的谷物发芽和发霉以后，引起糖化，酒精发酵，产生了“天然酒”，人们逐渐发现这种“天然酒”喝下去使人周身发热，精神兴奋，于是便开始有意识地用粮食发酵酿酒。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我国酿酒业已经发展起来，当时饮酒之风非常盛行。甲骨文中便有很多形状不大一致的酒的象形字，如“𩚑”和“𩚒”都是酉（酒）字，考古学者认为，这两个字的上面象是被煮沸的谷发酵后冒起来的泡沫，下面是盛谷物蒸煮用的器具。从甲骨文中还可看出当时祭祀祖先或祭神都要用酒，而且每次用量都很大。同时，从地下出土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物中，也可看到已有多种形状的酒器，如尊、罍、盃、卣、觚、鬲、方彝等，可见酿酒业已很兴盛。

从大量酿酒到制造药酒，又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甲骨文中“鬯其酒”的记载，据说“鬯”是指以百草之香与郁金合酿而制成的一种芳香的酒。说明很早我国已有药酒出现。

汤液是中药的一种主要剂型，即用水煎熬草药。汤液的发明，相传是一个精于烹调的奴隶叫伊尹^①创造的。伊尹是商代汤王妻子陪嫁的奴隶，是一位出色的厨师，由于才华出众，后来又曾升为商王的宰相。他还具有一定的医药知识，在烹调食物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一些调味品如姜、桂、枣等的作用，结合当时的用药经验，把食物加工的方法用来加工药物，将各种生药加水煎煮制成水剂。由此可以说明，汤液的出现与食物加工技术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有了汤液，使服生药变为服熟药，由单味药发展到复方，这样不但药效容易发挥，减少了药物的副作用，提高了疗效，而且服用也较为方便。因此，汤液的配制和应用，是当时医药学一项重要成就。

三、早期的卫生保健

奴隶社会时期，人们已经知道讲究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甲骨文中“洗沐”（洗头，象人散发洗面），洗澡（盥浴，象人在盆里用水洗澡）的记载。在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盥洗用具，1935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王墓中，已有壶、盂、勺、盘、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出土。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定期沐浴，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②的治疗意义。并且还有“鸡初鸣，咸盥漱”^③，以及不吃腐败食物等饮食卫生方面的记载。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开凿水井饮用井水的国家。1957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北省邯郸涧沟四千年前的遗址处，发现了两口干

^① 《史记·股本纪》、《甲乙经·序》。

^{②③} 《礼记》

润的水井,口径约2公尺,深达7公尺,形似竖井窖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水井。在我国各地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不少古代的陶井圈、井栏等,可见很早人们已知道维护水井的清洁和注意打水的安全,在井旁建造井圈或井栏,在井口放上井盖。说明这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饮井水有益健康。

在环境卫生方面,很早我国已开始人畜分居。在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曾发现饲养畜类的栏圈,甲骨文里有𠩺、𠩺等字样,据考证是牛棚和猪圈,这都是人与畜类分居的证明。

在河南省安阳发掘的商代遗址,还发现在奴隶主和平民住室附近已有地下排水管道。地下出土还有陶质圆形下水道,古书^①上记载:每年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换以新水,并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可见我国古代对居住区的污水排除问题已经开始重视。

我国人民还是进行清洁扫除最早的国家之一。甲骨文里有这样的记录:“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寇帚……”意思是在庚辰这一天占卜,要求人们在丁亥日进行一次清扫活动。古书^②还记载,每当国家有重大节日或祭祀活动,各地都要进行大扫除,至于岁终进行清洁扫除更是民间流传已久的卫生传统。一些古书^③中还记载了一些除虫灭鼠,保护环境卫生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及定期打扫房屋等。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刻有洒扫人的形象,手里拿着扫帚一面清扫,一面洒水,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清扫的情景。在出土的许多陶俑中还看到有“箕帚俑”一手拿簸箕,一手拿扫帚,形象十分生动。这些都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民已经有了一定的卫生保健知识。这些也是后来预防医学思想的萌芽。

四、医事制度的建立

奴隶社会时期,随着阶级的形成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化,各行各业也日益趋向专业化。国家设置了医事官职,建立了医务组织机构。根据《周礼·天官》记载,此时我国已有专业医生,并建立了早期的医事制度。在宫廷里医生已有明确的分工,有食医——负责管理饮食营养卫生;疾医——负责治疗内科疾病;疡医——负责处理疮疡、骨折等外伤疾患;兽医——负责治理牲畜疾病。

同时,还建立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治疗考核制度,年终要对医生的医疗成绩进行考核,根据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并且,明确规定:“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④说明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这无疑是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时建立的医政组织机构,设医师,为众医之长,承管国家医药政令,负责各地疫情,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疗;下设士、府、史、徒等专业人员。他们各有其责,士,负责治病;府,负责掌管药物、器具和会计事务;史,负责掌管文书和医案;徒,负责看护病人及杂役。这时还建立了记录治疗经过的病历,对于死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

专职医生的出现与医事制度的建立,不仅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水平,而且,有利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整理、总结和交流,从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①《管子》、《左传》

②《周礼》

③《周礼》、《仪礼》、《诗经》

五、医与巫的斗争

人类“灵魂观念”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晚期。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的变更，原始公社制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日益复杂，开始意识到人“死”后，是否还有“灵魂”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界许多现象如风、雷、雨、雪以及疾病、死亡等不可理解，既无法制服又无法解释，便自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存在着超人的“神”在主宰一切。加之，对祖先的崇拜，又以为疾病的发生是祖先降灾，于是便产生了最早的“灵魂观念”和“鬼神观念”。这是人类处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对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或者说是“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所以最早的“灵魂观念”、“鬼神观念”是在原始时代，人们对于自己本身和外部世界一种无知的虚幻观念之中产生的，开始它并不具有欺骗的性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对立阶级的形成，人类的意识形态也随着发生转变，就“灵魂观念”来说，只有奴隶主死后才有灵魂的存在，而奴隶是没有人格的“物品”，死后就像物品的消失一样，根本不会有灵魂存在。同时，随着奴隶制度的日益巩固，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使他们有权支配人间的一切，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需要欺骗和麻痹广大的奴隶，使其更驯服地为他们效劳，于是便从原始社会的“灵魂观念”、“鬼神观念”进一步发展，认为在“神的世界”存在着一个主宰一切的——“天帝”，人间的一切吉凶祸福，是由“天帝”赐予的，最大的奴隶主国王便是代天行事，是“天帝”的代言人。因此，奴隶社会时期，事无巨细都要向天帝祈求、占卜，在国家机构中还设置了“太祝”、“太卜”、“司巫”等官职。“太祝”是最大的祭祀官，“太卜”是管卜巫，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司巫”是巫师，用祭祀、祈祷等办法治病。从古代传说中可以看出巫师除了进行祈祷、祭祀等迷信活动外，掌握了一些民间的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山海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穿窬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祈祷当然治不了病，主要还是用“不死之药以距之”。这样就出现了医学史上一个医巫混同时期。

从8世纪开始，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思想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奴隶制度的衰落，天帝的代言人国王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逐渐形成，并且同无神论相结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医学界也不例外。

在医学领域，医学与巫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医学家，已经客观地从实际生活存在的物质因素中寻找疾病发生的原因，批判鬼神致病的观念。公元前6世纪郑国的子产就认为，晋平公患病是由“饮食哀乐女色”所引起，与鬼神无关。又如齐景公生病时，要加罪为他祈祷无效的臣子，齐国的大夫晏婴便明确提出：景公生病是因为“纵欲厌私”，祈祷是没用的，臣子是无罪的。公元前5世纪秦国的名医医和更摒弃了鬼神病因论，首先创造性地提出了“六气致病”的新观念，他用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异常变化解释各种疾病发生的原因。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病因观，虽然还没能具体解释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第三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些疾病的病因和病理问题,但是,它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摆脱鬼神致病的束缚,认识到某些疾病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着的物质原因引起的,这在医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以后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节 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我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到公元8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科学文化领域里也出现了新的形势。

封建制度的确立,使得处在社会上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都必然要对这一新的制度作出反映。同时,旧的思想意识、学术见解也不可能随着奴隶制度的灭亡,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加之,这时在各阶级分化和集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务农,不经商,出入官府,走访私门,靠传播知识为生。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服务对象不同,以及个人接受的文化传统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言论和行动。当时各国封建政府也很注意招揽人才,培植学派,促使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著书立说,阐发各自学术思想,广收门徒,培养自己的后继人才,互相争辩,形成了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局面。其中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和杂家等,各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反映着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对立与斗争。在政治上是维护奴隶制与建立、巩固封建制;在哲学思想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体系。这场争论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对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医学这时有显著的进步。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理、法、方、药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长期的总结积累和反复验证,这时期已经初步确立。

医学家以长期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为依据,吸收当时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创造性地进行了一次从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阶段的总结。在理法方药四方面都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成为医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施治的医疗原则;从《内经》到《伤寒杂病论》也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神农本草经》总结了丰富的用药经验和知识,奠定了药理学发展的基础。两千多年来,中医学一直是在这个理论上不断地充实、发展和提高的。

一、《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已经有一些古老的医药著作。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共14种简帛医书,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其中有些是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内容比《黄帝内经》要古朴得多。早于《内经》的医书,还可以从《内经》本身的记载中看到,《内经》里所引用的古代医书,据统计有21种之多,仅《素问·病能》中提到的古医书就有《上经》、《下经》、《金匱》、《揆度》、《奇恒》等五、六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已有医经七家,即《黄帝内经》、《黄帝